

【论 文】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¹

马 戎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习主席给民族理论界提出的重要任务

2019年9月习主席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这是中央确定的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列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在明确了主线和方向后，我们仍然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民族理论对这条主线予以阐述和说明，以便将其全面落实到我国民族工作各领域的具体实践中；需要编写相应的学校教材，把这些理论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在这个方面，习主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肩负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20世纪50年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制度政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影响²，这在50年代初期的国内外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经过研究机构和民族院校教师多年的努力，我党的民族理论逐步系统化。自1983年国家民委教育司编写《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试用教材）后，我国先后出版20多本相应教材（见附录1），结构与内容大同小异。这个民族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定义等）为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同时吸收我党多年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在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部分高校的相关课程中使用多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已成为我国政治话语传统组成部分的“民族”理论体系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的脱节逐渐显现出来：

1.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仍以经典作家论述为主要内容，脱离中国国情

经典作家特别是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但是，马恩列斯论述民族问题时的历史场景和政治文化环境与今天的中国存在极大差异，我国现有的民族理论和相关教材在这些方面缺乏说明和分析，无法引导学生和民众真正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具体观点，并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和身边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现有的民族理论叙述，多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摘引经典文献到引用中央文件，以此作为我党民族制度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依据。研究者极少分析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态势及其演变实况，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实证性调查研究和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客观评估。

我国民族工作需要理论指导，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社会变化而不断改进相关制度、政策和工作方法。解放后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工作，长期沉浸在文献检索和“理论话语梳理”中，欠缺我党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坚持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精神。认识社会内部矛盾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发现社会变化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难以得到实质性进展。相关教材基本内容几十年不变，只是随着领导最新讲话作局部补充。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

¹ 本文刊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第13-19页。

²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着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吴仕民，2016：30）。



道路、邓小平同志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都是在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中走过来的¹。中国的民族政策如想取得成功，也必须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路，在长期的社会调查和工作实践中总结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

2. 确立我国民族关系大框架的“民族识别”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被应用在56个“民族”层面²，参照这个民族定义提出来的民族“四大要素”重新建构各少数民族，强调各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居住地域、传统经济活动和共同文化心理，关注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孕育凝集的共性。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编写出版的55个少数民族《简史》、《语言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各民族青年一代认识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群体关系的知识体系。这种做法实质上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予以“肢解”，极为不利于培育和构建各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认同。习主席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但我国的民族工作多年来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而不是努力“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没有在“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面着力，这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民族识别和其他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努力方向，与我国理论界和教科书上提出的“民族”定义密切相关。长期以来，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都被称作“民族”。在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前后出版的民族理论教材，出现“中华民族”一词时有几种情况：（1）介绍民国文献提到“中华民族”（金炳镐，1984：62；等）；（2）引用毛主席语录时提及“中华民族”一词（金炳镐、王铁志，2002：18；等），（3）“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总称为中华民族”（布赫，2002：2；等）；（4）“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金炳镐，1994：373；等）；（5）“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江平、黄铸，1994：23；等）；（6）“我国各民族的各自民族归属感很强，都很热爱自己的民族，都为自己民族的发展奋发努力。同时，我国各民族又都认同中华民族，认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吴仕民，2016：5）。以上表述仅仅把“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的总称，但是当这些教材开始具体讨论“民族”定义时，则完全转为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各具体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共同文化）的详细讨论，完全不再提及“中华民族”概念，在讨论“民族政策”时则完全聚焦于56个“民族”的层面。这样的理论结构和话语体系在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的各自民族归属感”，虚化了“中华民族”概念，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必然导致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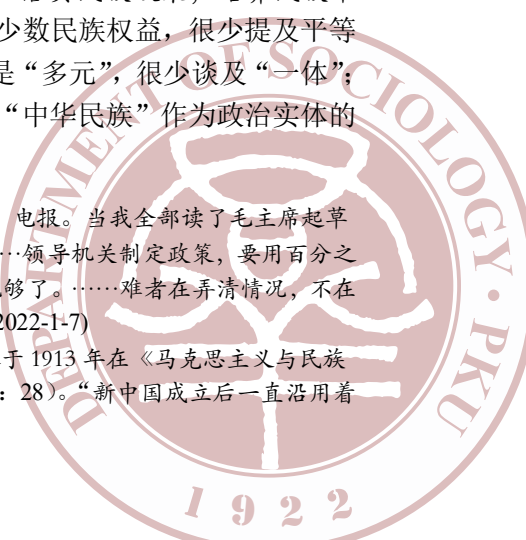
这即是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版和2018年以前历次宪法版本均缺失“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论根源。中央近期多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3. 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而不是“一体”

在我国民族理论教育和各级政府民族工作中，“尊重民族差异，落实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一直是主导性话语，强调尊重民族差异和少数民族权益，很少提及平等公民权、公民义务和法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强调的是“多元”，很少谈及“一体”；强调反对“民族同化”，绝口不提“民族融合”；个别学者甚至否认“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实体的

¹ 陈云同志曾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629/c85037-31762302.html）（2022-1-7）

²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科学的民族定义，是斯大林于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吴仕民，2016：28）。“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着



存在¹。这些观点和思想倾向既不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不符合列宁有关“民族融合”的主张²，也不符合中国当前民族关系发展的主线。

多年来，在讨论我国的民族理论和开展民族工作时，只要提到“民族”一词，人们想到的就是“少数民族”。这个“只讲多元，不讲一体”的民族话语体系在理论宣传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在各项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加深了各族民众之间的群体区隔，不利于加强各族干部和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特别是以这一民族理论为主导的相关教材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强化了各族学生的“各自民族归属感”，并影响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是现有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科书和中学相关教材必须系统重新修订的主要原因。

4. 我国民族理论与现实民族关系演变之间明显“脱节”

自20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我国有些地区民族关系一度明显恶化，发生多起严重恶性群体暴力恐怖事件。但是，现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科书既不能深刻地解释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告诉我们今后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地改善我国的民族关系。这表明现有民族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间出现严重脱节现象，已经成为阻碍落实中央提出的当前我国民族工作主线和方向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既有辉煌也有失误。工作中的失误曾出现在经济规划领域（“大跃进”）和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毋庸讳言，我们在民族工作中也存在失误，否则在我党全面执政、掌握党政军司法文教所有系统的形势下，一些民族地区不应该出现如此强烈的离心倾向和严峻的社会稳定问题。建国70年了，我国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绝大多数出生在解放后，成长在新中国，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各级学校接受的教育，学习的是政府组织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系统教材。我们必须承认，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本民族意识较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淡漠，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国民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领域出现的严重偏差，都与现有的民族理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政治大方向的指引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系统梳理我党在民族理论建构和民族工作实践中走过的历程，组织各民族地区的深入社会调查，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构建立足本土、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重新编写学校教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中发挥政治引领的重要作用。梳理原有教材，并不是将其简单否定，而是吸取经验教训，与时俱进，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民族理论教育和开展民族工作。

习主席提出：“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国的民族理论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和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科学精神，提出符合当前中国社会进程“与时俱进”的民族理论体系。

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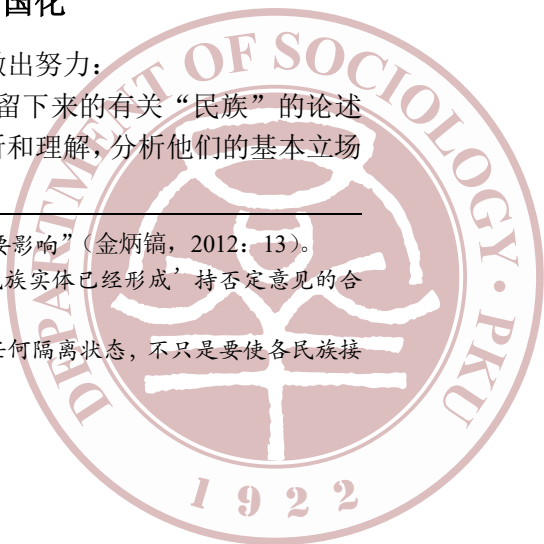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经典作者们留下来的有关“民族”的论述和具体观点放到他们当年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来分析和理解，分析他们的基本立场

这个民族定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金炳镐，2012：13）。

¹ “我们也要看到在国内层次上考察民族概念时，某些学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持否定意见的合理性和理论价值”（李贽，2016）。

²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宁，1916：719）。



（反对封建世袭专制社会制度，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等）在当时每个具体场景和事件中是如何表达的，分析他们提出各项具体观点时的分析方法与论证逻辑。这些解读与讨论将有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经典作家们写作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他们的观点内涵，将其转变为活生生的知识和思想方法，避免把经典作家的具体观点予以机械的理解，将其“公式化”和“绝对化”，并简单地套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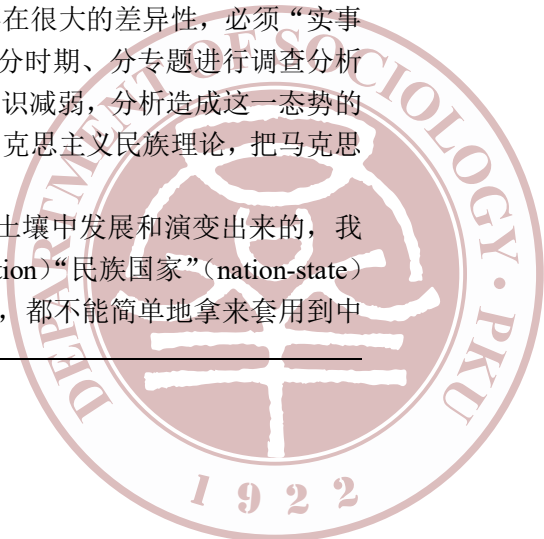
2. 在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中，要把基本政治纲领与某个特定时期、某地区局部具体革命斗争的策略相互区分开来。在革命斗争中，有时需要根据外部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妥协和让步，有时需要根据某些制度和政策的客观实践效果对之不断加以修正纠偏。如列宁曾明确反对联邦制，在十月革命后的现实形势下转而赞同联邦制，但称其为“过渡形式”。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足迹可以帮助我们丰富和加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将其视为活生生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僵化生硬的教条文字，有助于全面和系统地理解他们如何工作实践中推进理论探索，从而避免在解读中出现偏差。

3.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客观条件不断推动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各国在民族/族群问题领域的长期实践活动的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从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应当坚持在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中重新理解和认识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无疑与这两个国家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政策设计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关。而我们对这两个国家以“民族”为单元发生政治解体的原因和机制并没有真正在理论上说清楚。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已对此开展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论述与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社会实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苏联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发生的政治解体能够为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什么启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不应当回避。

4.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和南斯拉夫以“民族”为单元发生解体的深刻理论和制度原因，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国家的发展规律。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各国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格局与今天面对的国内民族问题千差万别，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当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演变规律，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内部现实的民族矛盾，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在处理民族/族群关系方面的成败得失，我们必须拓展视野，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吸取政治智慧。

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开始，一直在探索如何表述和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我党在这方面有大量历史文献需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1949年建国后，我党作为执政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已有七十年的大量实践。我们应当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解读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把党和政府民族工作文献的研究与中国各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各有不同历史和社会特点：历史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与我党的历史渊源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传统不同，经济上与内地的联系与依赖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各地区之间在许多重要领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必须“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我们必须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演变过程分地区、分时期、分专题进行调查分析和理论概括。看看哪个时期当地民众更认同国家，哪个时期认同意识减弱，分析造成这一态势的制度政策原因和具体影响因素。调查研究是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

6. 中国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史是在中国国土和中华文化这一土壤中发展和演变出来的，我国的民族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无论是西方“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话语、“族群”（ethnicity）话语或者苏联的“民族”（нация）理论，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套用到中



国社会，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土壤，理论联系实际，根据社会调查研究和政策实践总结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对中文“民族”这个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再诠释，梳理 nation、ethnicity 等核心概念在西方的缘起与演变，以及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国人的解读与使用，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核心概念予以重新定义，以此奠定我国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理论自信。

这些研究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些要求具有明确的时代针对性。中国的民族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理论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中构成人类社会共享的知识体系。

三、创建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苏联解体导致两极化国际体系的终结，世界各国族群关系和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多种新态势，我们需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理解其科学精神，分析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各国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得失。中国的民族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指导，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基础，对建国70年来的民族工作历程中的得失进行经验总结，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科学精神，在对我国民族关系现状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总书记的论述持续推动我国的民族理论实现创新性发展，

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要求最终落实为创立一套新的理论话语体系，既要在理论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具体观点也要符合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并在社会实践中切实服务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同时，要把马恩列斯的相关论述与中国具体国情、民族关系历史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考虑如何把国际社会有关共识（平等、公正、人权等）用于解读中国的民族制度与民族政策，努力构建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舆论界进行交流的基本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把民族理论纳入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话的核心内容，在民族理论和研究领域讲出能够令各国信服的“中国故事”，在这个领域提高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建议的理论概念体系中把“中华民族”定义为“民族”（nation），与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等相对应，同时把我国的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与美国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相对应。这将有利于外国学者把中国的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放在“族群”层面而不是有自决权的“民族”层面来理解。中央重要文件（民族区域自治法、党章等）中的“民族区域自治”英文版曾误译为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¹，虽已部分得到纠正，但是这也说明我国民族理论界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理解依然存在分歧。

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确实会发生冲突，但处理文明冲突时可以有不同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一神教传统的文明体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对待不同宗教集团的互动时，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圣战”传统和对“异教徒”的绝对排斥。这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的“双重标准”的基督教文化特点。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是“非有神论”的世俗性，在处理内部的族群文化多样性及与外部其他文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交往中秉承的态度是“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体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族际交往中得以延续并发展的文化优势。习主席强调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

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翻译，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英文对照本）中，“民族区域自治”译为“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2018年宪法修正版也曾作同样翻译（叶江，2018：1）。



即是以“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把国内各族群紧密地凝聚起来，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政治打压、贸易战、“颜色革命”和战争威胁。同时，习主席又把中华文化的这一基本理念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毕生的事业¹。“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在新时代的伟大奋斗目标。习主席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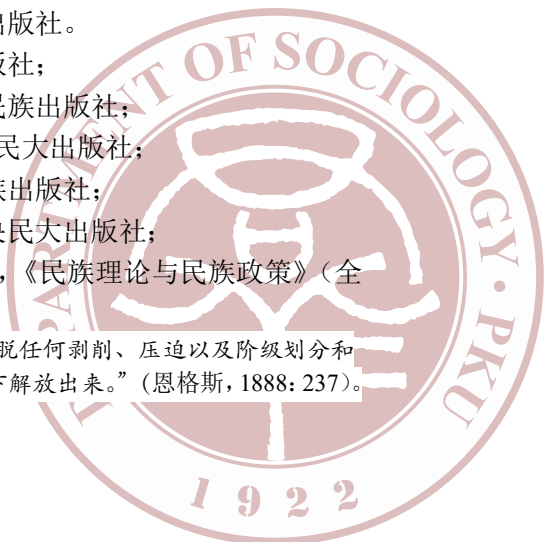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调查研究和政策实践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现在民族理论界观点分歧很大：如有人撰文提出放弃使用“中华民族”概念（都永浩，2010）；《中国民族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华民族形成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李贲，2016）。如果尚未形成，何谈铸牢？该报另一篇文章强调“‘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a）；还有一篇文章强调“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存在的公共事权，应当遵循协调与协商的原则”（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b）。这些都显示出在国内民族理论界和主管部门中存在重大理论分歧，应当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尽快把认识统一到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上来。

习主席近期讲话的许多重要内容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工作指出了大方向和研究要点，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重要意义、民族工作与法治的关系、各族人口格局新变化、互嵌式多族社区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我们必须以这些指示为引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党的领导下切实改善我国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附录：我国出版的部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

1.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81，《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2. 国家民委教育司编印，1983，《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内部发行）；
3. 金炳镐，1984，《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大出版社；
4. 熊锡元，1985，《民族问题理论基础》，云南省社科院印刷；
5.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编写组，1985，《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
6. 布赫主编，（1986）200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 徐杰舜主编，1988，《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广西教育出版社；
8.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编写组，1988，《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
9. 江平主编、黄铸副主编，1994，《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央党校出版社；
10. 王克文主编，1995，《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央党校出版社；
11. 吴仕民主编，1998，《中国民族政策读本》，中央民大出版社；
12. 金炳镐、王铁志主编，2002，《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3. 徐玉圻主编，2002，《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14. 图道多吉主编，2002，《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山西教育出版社；
15. 罗树杰、徐杰舜主编，2005，《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程》，民族出版社；
16. 金炳镐，2006，《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修订本），中央民大出版社；
17. 沈桂萍、欧光明主编，2007，《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概论》，民族出版社；
18. 薛洁、金炳镐主编，2011，《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中央民大出版社；
19.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编写组（金炳镐任主编），2012，《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全

¹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恩格斯，1888：237）。



- 一册) (高等院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试用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 孙振玉主编, 2012, 《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发展》, 民族出版社;
 21.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编写, 2013,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干部培训教材), 民族出版社;
 22. 金炳镐主编, 2014,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3. 吴仕民主编, 2016,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3版)(全国民族院校统编教材), 中央民大出版社;
 24. 丁龙召、李晶主编, 201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第三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5. 龚永辉主编、杨社平、郭亮副主编, 2017, 《民族理论政策讲习教程》(中国大学MOOC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 沈林编著, 2017, 《中国的民族国情与理论政策》, 知识产权出版社;
 27. 国家民委研究室编, 2019, 《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 民族出版社;

其他参考书目:

- 都永浩, 2010, “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1期, 第11-21页。
- 李贽, 2016, “中华民族观的时代解析”, 《中国民族报》2016年8月12日第5版。
- 列宁, 1916,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列宁选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716-729页。
- 恩格斯, 1888,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34-239页。
- 熊文钊、多杰昂秀, 2017a, “我国民族区域制度的三大源流”, 《中国民族报》2017年11月17日第5版。
- 熊文钊、多杰昂秀, 2017b, “推进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治化”, 《中国民族报》2017年12月1日第6版。
- 叶江, 2018, “古希腊语词汇 ‘ἔθνος’ (ethnos) 在西方古代后期文献中的内涵探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第1-8页。

